

一个有趣的灵魂

——评《谢冕人文讲演录》

□舒晋瑜

7日在北京大学中文系2017年度开学典礼上的致辞)

可是,在2018年10月16日举行的“一生只做一件事:谢冕先生与中国百年新诗——《中国新诗史略》新书发布会”上,著名学者严家炎先生上台只说了一句话:“谢冕先生不是一生只做一件事,而是做了很多事。”他的幽默引起满席欢笑和热烈掌声。因为大家觉得,严先生说的也不无道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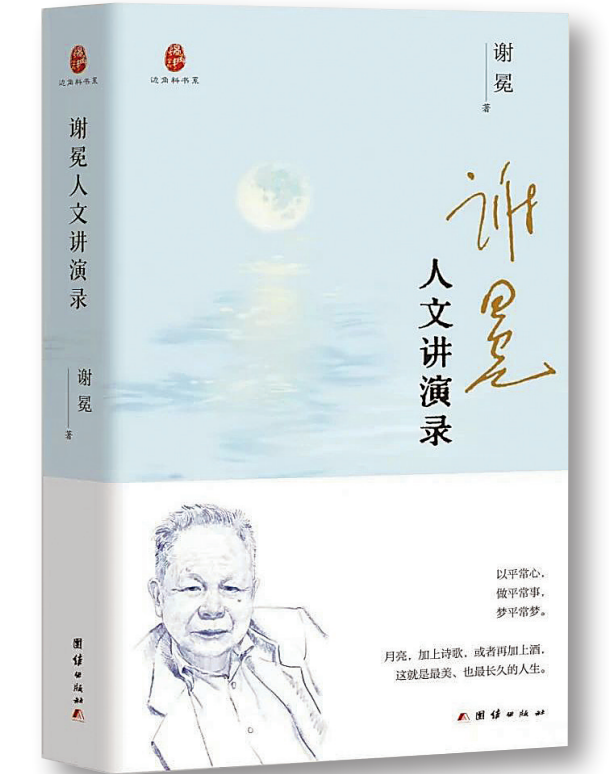
谢冕先生从小喜欢读诗、写诗。考入北大中文系,他参加了北大诗社,后来编《红楼》,是诗歌组组长。大三时,谢冕先生和孙绍振等一起写作《中国新诗发展概况》,这是他从诗人转变成一个研究者的重要转折。20世纪 80年代,谢冕先生曾主持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在研究所的名下成立了诗歌中心,编了几年的《诗探索》,“这些都是义工,不仅没有报酬,而且时常自掏腰包”。(2011年 9月24日在北京大学中坤诗歌基金建立五周年学术论坛”上的发言)

作为北大教育者,谢冕先生始终秉承学术自由、思想独立。他尊重每一个作家的自由创作,主张宽容。1980年5月7日,谢冕先生在《光明日报》发表《在新的崛起面前》,在诗歌界引起很大反响。他看了年轻人的诗歌,满心欢喜,知道这是诗歌的希望。谢冕先生是按自己的感觉说话,认为应该写这样的文章。这也和北大的传统有关:讲究学术的独立,不受任何影响。文学的爱好与写作是多元的,不应固守一隅。

新诗经过了一百多年的历史发展,谢冕先生提出,新诗和旧诗应该和解。从“新的崛起”到“百年和解”,他为近半个世纪的中国新诗的发展与变革划出了一条简约的脉络。“新诗的确是展开了中华诗歌的新生命,它规避了古典诗歌那些与世隔绝的弊端,能够零距离地拥抱鲜活的现实生活。一种摆脱了格律约束的、接近于日常口语的自由的诗歌体式,空前地拉近了诗歌与社会变迁、日常生活的距离,于是它成为我们不可须臾脱离的表达思想情感的方式。”(2011年 9月30日在第三届中国诗歌节诗论论坛上的发言)

在中国新诗发展的不同阶段,都有谢冕先生的创见和贡献。他热爱诗歌,一直关注着诗歌,不止一次地呼吁改变诗坛沉闷的现状,呼唤新诗回到公众生活,回到诗歌艺术的自身,回到诗性和诗美的建设性的、良性循环的状态:“在中国,诗歌如同往常那样,许多人在写,写得很多,但是很少有人感动而且广为传诵的诗。也许‘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真的成了世纪的绝唱,从那时到现在,我们一直等待这样动情的诗歌,然而,奇迹没有发生,而我们依然等待。”(2010年6月23日,于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

他敏锐地捕捉着好诗,不论是寂寂无名的青年诗人还是底层的打工者。在《河南诗人》创刊一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1年6月)中,谢冕先生朗声诵读《嵩山北部山上的栗树林》:“让人沉默的是九月的栗树林/让人疼痛的是远离夏天的栗树林/月光下一群白鸟飞越/ 让人说不出话,让人感到无望的/是覆盖了整个山坡的风中的栗树林”。谢冕先生并不认识诗歌作者,尚不知作者是河南许昌一家医院的护士杜涯,却为诗人的疼痛、无望与悲伤深为感动;他喜欢陈年



《谢冕人文讲演录》,谢冕著,团结出版社,2025年3月

《谢冕人文讲演录》出版了,这是诗坛、更是文学界的一件喜事,我们获得了另一种接近谢冕先生的方式,通过他的讲演,确切体悟他的纯粹和高尚、他的宽容和博爱。收录其中的文章,是他在北大、安徽、扬州等不同场合的讲演,真切地表达自己对诗歌、文艺的感受和思考,表达自己对时代、民族的微言大义。阅读《谢冕人文讲演录》,我们不仅是在重新认识一位诗情激越、心灵纯洁的诗人,也是在重新认识一位谨严的诗评家,更是重新认识谢冕先生的艺术实践和诗歌精神的过程,这里不仅有声音、有场景,还是一个有趣灵魂的浓缩和显影。

谢冕先生常说,自己用一生的时间只做了一个诗歌梦。一辈子只做文学,文学只做了诗歌,诗歌只做了新诗,新诗只做当代诗。“一个人精力有限,除非像王国维、闻一多那样的天才,一般人一生能做的事很少。我认定,我的一生能做好一件事就是我的福分。这是北大教我的,后来我同样教给了我的学生:踏踏实实做一件事,争取在这个领域拥有发言权,这就要付出你的一生。前面我列举了中文系语言学上的许多权威,王力也好,朱德熙也好,魏建功也好,他们无不如此,为一种学问,付出毕生的努力。”(2017年9月

解开历史之结的姿态与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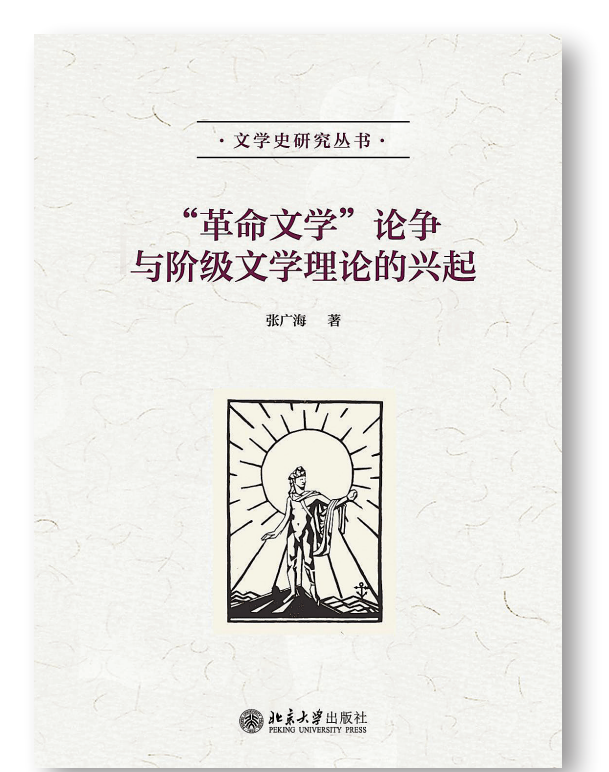
——评张广海《“革命文学”论争与阶级文学理论的兴起》

□王开軒

“革命文学”论争是怎样发生的?论争各方究竟在争什么?时至今日研究者依然被这些1920年代末的问题困扰。困扰一方面源于重回历史的艰难,另一方面源于“革命文学”论争呈现出来的复杂样态。论争过程的曲折、理论与情绪的错综,使历史以一种扭结的姿态展露在我们面前。解开历史之结与重回尽可能真实的历史现场,也就成为中国左翼文学研究的前提。在此意义上,张广海新著《“革命文学”论争与阶级文学理论的兴起》(以下简称《“论争”》)在追问未解的历史难题的同时,也让更多似乎已然确凿的“事实”再问题化,从而呈现出中国左翼文学研究的新貌。

视野与缺口。中国左翼文学的行动往往由理论催生,而理论则提供理解行动的视阈。作为“革命文学”论争前奏的后期创造社与太阳社之争,既涉及理论问题,也涉及历史问题,而处理历史问题的视野直接决定了理论问题的理解限度。历史地看,论争双方在将理论诉诸批判实践的过程中,始终在能动地调整着理论的内涵与呈现。但相比于明了论争双方的思路以及理论内涵,既往研究往往将论争主体放置在既定框架与模式中理解和把握。围绕斋藤敏康的论说形成的“斋藤框架”即为此例。这些根源为“影响说”的论述方式,常常会把“革命文学”论争简化为域外思想的中国翻版。在此意义上,《论争》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历史图景。该书强调,即使二社皆存在吸取域外理论的客观事实,但一方面理论获取的途径多元丰富,另一方面,理论也在吸收的过程中被加以种种改造。在概括前期太阳社对域外理论资源的接受时,张广海以“更侧重”“回避”“暗中置换”等语词提示理论在移植过程中的变迁。既然理论存在变化,那么就无法完全通过原初的理论来把握论争双方的批判动因与行为逻辑,更无法将“革命文学”论争进行一体化处理。因此,张广海从发生学的角度细化并填充了论争双方的理论暗区,由之将理论与论争粘连在一起。这一工作既厘清了“革命文学”论争内部的发生机制,更以理论视野帮助我们加深了对留存的历史问题的认识,补足了论争的理论缺口。

“横站”的姿态。在“革命文学”论争中,后期创造社与鲁迅之争无疑居于中心位置。但因鲁迅的存在,相关讨论往往无法避免“前理解”所设置的困境——研究者更倾向于站在鲁迅的立场上来评价这场论争,后期创造社成员也就因此成为自恋的空头革命家。在《论争》中,张广海并没有从某种特定立场出发通盘肯定或否定某一群体,反而以“横



《“革命文学”论争与阶级文学理论的兴起》,张广海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6月

站”的姿态,将尽可能真实的历史现场还原于论述之中。

“横站”之于鲁迅是一种政治姿态,这种象征化的形象同样见于《论争》一书。张广海并没有如过往研究那样过多贴近鲁迅的立场,也没有全然为后期创造社张目,而以“横站”的姿态重勘后期创造社与鲁迅论争始末。

站在横向的参照系中,张广海面对鲁迅的态度令人印象深刻。比如鲁迅在被后期创造社成员“挤”去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之前,《论争》指出:鲁迅其实面临着“在新的话语场中缺少言说能力”的危机与“理论焦虑”,因此他“诚挚、迫切”地“驰书求助”于“通晓俄语、熟悉苏俄马列文论的

喜用生命写的诗:“我的中年裁下多少/他们的晚年就能延长多少”。陈年喜写了中年人的负担,这负担如此沉重,但是他没有滥情。

他为这些好诗没有被及时发现和推广感到惋惜,他希望诗歌能够表达时代的情绪,唤起更多的共鸣。一首《春江花月夜》,孤篇盖全唐。如果没有一个时代在支撑,怎么会有如此淋漓尽致的表达。所以他主张诗歌不能脱离时代,为当代写作就是为历史写作。

有些人老了,难免怀想过去,沉湎在过去的荣光里,或聚在一起兴致勃勃唱老歌。谢冕先生从不参加。“我才不呢!”我总想起他说这话时倔强而天真的表情。他说:“我的青春从中年开始,从今天开始。昨天不属于我,明天不可预测,未来不可预测,只有今天,珍惜今天,为今天干杯。”

“我才不呢!”这里有他对命运的不屈服,对过往的不介怀,更有他少年般的叛逆和纯真。世间万物,都只是短暂,唯有诗歌永远。好诗长存万世,它不会衰老,伴随着一代又一代人,在心灵中永存。愈是好诗,愈是永久,这是世上唯一能够永葆青春不朽的事物。“在我的一生当中,与诗歌的记忆相连的都是非常美好的,所以我说好像最后我们就剩下诗歌了,剩下诗歌就是剩下我们最大的财富,善良、爱心、悲悯、同情、宽广而伟大的爱,这就是我们人生的最高境界……与诗歌相关联的一切都非常美丽,与诗歌无关的一切可以忘记。”(2012年在首届南太湖诗会上的发言)

谢冕先生不喜欢唱老歌,不喜欢说旧事,也不喜欢絮絮叨叨。他喜爱“二十岁教授”的称呼,欣赏“老顽童”的谑称,但他不是浅薄的乐观主义者,因为他对世间的苦难早已洞彻于心。

多年来,我们在各种会议上有过交集,有过多次采访,并已经超越了普通的采访者和采访对象的关系。谢冕先生豁达包容的人生观、幽默风趣的谈吐、坚韧不拔的品格,总是带给周围人很多欢乐,他所到之处,总有热情的诗人追随,而他总是背着两手,像将军一样昂首挺胸。他的发言让人耳目一新,总能钻到听众心里去。集子中的很多讲演,我曾亲耳聆听,如今见到文字,相当于重温了他几席发言。开篇《古典的压力》,是2005年10月25日首届中国诗歌节在马鞍山举办时,谢冕先生在诗论论坛的致辞,当时我也在场。

时间像无声的流水,倏忽已经过去20年了。我至今记得他自信的神态、睿智的眼神、掷地有声的话语。从作于1975年3月18日的《关于散文》至今,这本《谢冕人文讲演录》涵盖了50余年间谢冕先生在各种场合的演讲,处处可见北大中文系的学术传统。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精神,到当代文学批评的前沿思考,谢冕先生始终站在学术的最前沿,以开放的胸襟拥抱各种思想潮流,同时又保持着清醒的批判意识;他既是中国文学传统的守护者,又是新思想的开拓者。这种双重身份使他的演讲既有历史的深度,又有时代的气息;他不仅以深厚的学术造诣滋养着一代代学子,更以独立的思想品格影响着文学界。

(作者系《中华读书报》总编辑助理)

学生”。张广海论述的前提,正是将鲁迅视作一个动态的,不断更新、生成的历史主体。因此,他根据重勘历史给出的结论固然重要,但在重勘过程中呈现出来的历史的繁复样貌更为可贵。

为何是“唯人主义”。“立人”概念是鲁迅研究的核心概念之一。众多学者都曾围绕鲁迅的“立人”展开论说,张广海的论述同样涉及鲁迅的“立人”,但却将“立人”更换为“唯人主义”,该如何理解这种改换?

虽然在《论争》中,张广海指出“唯人主义”是“借用彼时流行的主义话语”,但其背后的考量,显非“借用”那么简单。在他的论述中,“唯人主义”并非普通的定义,而只是论争中的一种“批判方式”,这种“方式”脱胎于鲁迅一贯的“立人”思想。但重要的是,鲁迅并非只是只带着“立人”思想介入到论争中来的,其思想存在另外的生发机制。在这种新的机制中,“立人”拥有了崭新的思想质素,由此才成为一种应时的“批判方式”。鲁迅在与后期创造社论争时产生的思想,根柢仍是“立人”,但此处的“立人”是被语境化的“立人”。张广海便指出,托洛茨基的“革命人”思想等都对鲁迅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语境化因其带有的斗争性与立场感必然会造成“立人”概念内涵的缩放与变异,“唯人主义”由此得以成立。因此,“唯人主义”与其说是对“流行的主义话语”的“借用”,不如说是贴合历史语境的、对鲁迅的新理解机制的提炼。

从模糊到明晰。王汎森在《探索五四历史的两条线索》中曾以“Confused period”(模糊阶段)来描述“五四”,认为“五四”是一个“新旧标准、事物混在一起,暧昧不明的阶段。旧概念失去意义,新观念迅速流行,无时不在地重构,是一个轨迹不定的运动”。不难发现,“革命文学”论争发生的年代同样处于这种“Confused period”之中,“模糊”构成了“革命文学”论争很长一段时间的存在状态与历史风貌,而对这一阶段展开研究的学者,都在努力让这种“模糊”变得明晰。也只有在这一研究脉络中,我们才能意识到张广海《论争》一书的创见与价值。在内容层面,须承认“革命文学”论争构成了后来“无产阶级文学理论发展的逻辑起点”;而在内容之外,论争开展的外部环境、论争双方的论战姿态同样需要厘清、归位。在这个意义上,从模糊到明晰也就不只是无限接近历史真实的努力,而是一种面对历史的主体自觉。

(作者系中南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程学源早期的诗歌创作,向来以对个体情感世界的细腻描绘与生活哲理的深度挖掘,在广东诗坛乃至更广阔的文学领域收获赞誉,历获广东省鲁迅文艺奖等奖项。而在1997年香港回归这一历史性重大事件来临前夕,他与关飞、晓籓、林晓东共同创作的千行政治抒情诗《百年期待》,被评论界誉为国内诗坛一首重要的香港主题长诗,认为其呈现了“总体性视野中诗人的历史感和现实精神”,“也是新时期以来深圳长篇政治抒情诗的收获”。

程学源的政治抒情诗《紫荆花开别样红》承《百年期待》余韵,以香港回归为叙事原点,在历史纵深与诗性想象的张力中,兼具史诗品格与抒情特质,既是对特定历史时刻的文学回应,也是对民族文化基因的诗性解析。诗人通过意象系统的创新编织、时空结构的精密设计以及传统诗学的现代转化,将个体情感升华为集体记忆,使诗歌超越单一抒情维度,成为民族精神觉醒的审美见证。

诗歌开篇即以冷峻的历史回溯奠定叙事基调,《南京条约》《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的指涉,将殖民记忆具象化为流淌在民族血脉中的创伤。诗人以“浮萍下的水/依然汹涌”的隐喻,暗示历史暗流的持续性,同时通过“时针嗒嗒踩着历史拍子”的节奏化处理,将线性时间转化为可触可感的时空意象。这种处理方式不仅打破了传统历史叙事的平面化倾向,更通过“擦净血迹”“托起腾飞之翼”等极具张力的语言,完成从历史屈辱到精神觉醒的叙事转向。香港回归在此被赋予双重意义:既是百年殖民史的终结符,亦是民族复兴进程的起始点。当诗人以“1997/我们为这个数字自豪”的直白宣告激发集体共鸣时,“亿万心海彩旗飞舞”的视觉化铺陈,则将抽象的民族自信转化为可触的诗性现实。这种从微观情感到宏观叙事的升华,既展现诗人创作视野的突破,也使诗歌成为时代精神的审美容器。

意象系统的建构彰显诗人对政治诗学的深刻思考。长江、黄河作为贯穿全诗的核心意象,既承载“奔腾气魄”的原始力量,又通过“不改肤色”的身份隐喻,将地理空间转化为文化认同的符号。在“长江扬起波涛”“黄河以奔腾的气魄”等表述中,河流的物理属性被升华为民族精神的具象表征,其流淌的轨迹暗合中华民族从沉沦到崛起的命运曲线。紫荆花的意象转化尤为精妙:从自然植物到政治符号的诗性跃迁中,“开在每个港人的骄傲里”的拟人化处理,既呼应官方话语的象征体系,又通过“满眼紫荆”的视觉叠加赋予其超越性的文化生命力。维多利亚港、太平山等地标意象的嵌入,则在空间维度上构建起香港从殖民伤痕到回归新生的历史轨迹。这种意象编码策略在保持价值导向的同时,通过隐喻的开放性为诗歌注入多义性,在官方话语与诗性话语之间建立起微妙的平衡。

诗歌的时空结构设计体现出史诗性追求与现代性反思的辩证统一。表面遵循“历史回溯—回归庆典—未来展望”的线性逻辑,实则通过“朝阳分挽”的诞生意象与“三角帆吟唱未来”的开放性结尾,形成螺旋上升的时空。殖民记忆的蒙太奇式闪回与回归盛典的狂欢场景并置,在“时针嗒嗒”的节奏中交织成复调叙事:既有“祖先亡灵”穿越历史隧道的低沉吟叹,又激荡着“亿万欢歌”的时代强音。这种声部交织不仅突破单一颂歌模式,更在历史纵深与现实图景的对话中,揭示出民族精神承续的深层逻辑。

在诗学传统与现代意识的融合层面,程学源展现出创造性转化的自觉。黄河、长城等传统符号经由现代编码获得新生:“太阳终于笑了”的拟人化改写,既承袭古典诗词的家国情怀,又通过光意象的变形注入当代政治语境的新内涵;对偶句式的解构与重组,将骈文传统转化为辩证的历史观照,如“历史的隧道口/以它永恒的光芒/将明天照亮”中,隧道意象的幽闭感与光芒的穿透性形成张力,暗示历史记忆对未来的照亮作用。诗人对艾略特“客观对应物”理论的化用颇具创见,“历史隧道”的隐喻将抽象时间具象为可感知的空间意象。但这种转化并非简单的技巧移植,而是以民族文化为根基的选择性吸收——当现代主义的碎片化叙事可能导致虚无时,诗人始终以民族复兴为价值锚点,体现出儒家“文以载道”传统与五四以降现代文学主流传统的双重影响。这种创作立场使诗歌在保持艺术性的同时,始终与现实语境保持紧密对话。

诗歌的语言策略同样值得关注。在“盼着回归的香江/披着不可阻挡的风采/奋步向前”等段落中,动词“披”“奋步”的精准选用,赋予香港拟人化的动态形象,使回归进程呈现出势不可挡的史诗气魄。而“洗净身上的污垢”的净化隐喻,则将政治仪式转化为精神洗礼的诗学事件。诗人巧妙调和古典诗词的凝练与现代诗的散文化倾向:如“时针嗒嗒踩着拍子”既暗合传统对仗韵律,又以自由句式打破形式束缚;“蓝眼睛与黑眼睛”的并置在音节上形成抑扬顿挫的节奏感,内容上则构成文化对话的象征。这种语言实验既保持抒情强度,又为政治话语注入诗意弹性,展现出诗人驾驭重大题材的艺术功力。

作为当代政治抒情诗的重要实践,《紫荆花开别样红》的启示意义是多方面的。程学源通过意象系统的符号重写、复调叙事的结构实验、传统资源的现代转译,以宏阔的视野、强烈的情感和创新的语言,为当代政治抒情诗创作在民族叙事与现代性的融合方面提供了新的探索——在解构与重建、传统与现代的张力中,完成了民族精神的诗性重构,并在当代诗歌创作的大背景下,为重大历史题材的诗歌创作提供了宝贵经验和有益借鉴。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深圳市作协监事长)



民族精神的诗性重构

——读程学源的《紫荆花开别样红》

□于爱成